

歌剧分析的传统研究范式与当代创新路径

康 啸

[摘要] 歌剧分析具有鲜明的传统研究范式与当代创新路径。传统研究范式围绕音乐本体、戏剧结构与思想观念展开：在音乐层面，以乐谱细读为基础，结合史料考辨探究其与戏剧叙事的关联；在戏剧层面，聚焦情节、人物及音戏共生关系；在思想层面，关注作品承载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内涵。20世纪中叶后，歌剧分析产生了当代创新路径，开始从多维度进行拓展。“导演歌剧”的兴起使舞台的呈现成为研究重点，数字技术的融入让舞台设计有了更多可能，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数字灯光、投影等技术为舞台呈现提供了丰富的创意空间；数字技术推动声音研究量化，如数字音频调音台可实现对舞台音频曲线数据的实时掌握与保存，以全数字化处理提升声音质量，为研究演唱风格与表演差异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撑；动作捕捉技术将身体表演纳入视野，实现了从经验阐释到实证研究的转型。歌剧研究需要吸收西方理论成果，立足本土实践，提炼中国特色分析概念与框架，推动文本细读、技术赋能与文化阐释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 歌剧分析；音乐本体；戏剧结构；表演研究；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J609;J61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26)02-0001-10

DOI:10.20093/j.cnki.CN21-1080/J.2026.02.01

一、引言

分析是观察有形世界、思考无形空间的基本路径，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思维方式与基础研究方法，是音乐研究的核心手段，分析法的创新更是推动音乐理论研究的重要驱动力。

从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看，分析法的应用源远流长。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的本

质、结构、功能进行系统剖析，将情节、角色、对白等作为悲剧构成要素展开深入探讨，到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戏曲声律的条分缕析，分析始终是穿透艺术作品表象、抵达艺术本质规律的核心路径。

“分”字，其甲骨文、金文、小篆类似，中间为“刀”，将“八”两部分割开，象征剖分、解析，意为使整体变成部分或使连在一起的事物离散，与“合”相对（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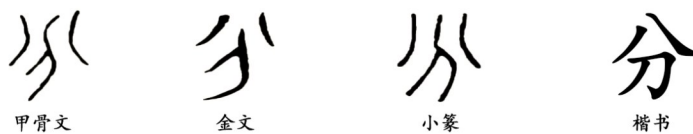


图1 “分”字的历史字形

作者简介：康啸，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西方歌剧流派研究”（22BD077）。

析，本义是将树木砍断。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从斤^[1]。“析”，古字均有砍树之形，即斧刃

劈开木理，象征对事物内在结构的深入探求（见图2）。



图2 “析”字的历史字形

“分”“析”二字合用，即分而究之，是由表及里、从整体到细节的解构过程，意为把一事物（或现象、概念）分成各个部分，找出这些部分的本质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与“综合”相对。分析的英文为 analysis，源自中世纪拉丁语 analysis（解剖、解析），其词根可追溯至希腊语，由 ana（向上、向后）与 lyein（解开）构成，意为“松开”或“分解”。其语源不仅揭示了“分析”作为“拆解整体以察其构成”的原始含义，也暗含了通过逆向追溯以还原本质的思维取向，与中国汉字“析”之“破木见理”的意象遥相呼应。“分析”词源中的会通之意，暗示了东西方思想在方法论层面的潜在共鸣。无论是“析”的破木见理，还是“analysis”的溯源解缚，都强调了通过分解以通达本质的思想。

分析一词，自古兼具解构与重建的双重旨趣。对音乐研究而言，分析法是最基础且最需要研究者深耕和掌握的核心方法。分析法关注研究对象的本体结构，即将研究对象拆解至最小结构，再进行特征观察与重组，但也密切联系事物的外部环境条件。

在歌剧研究领域，分析思维与手段贯穿歌剧研究的全过程。无论是瓦格纳“整体艺术”理论体系背后的哲学逻辑，还是普契尼歌剧旋律构造中的情感机制，都需要通过严谨细致的分析才能揭示其内在秩序、叙事逻辑和审美内核。随着传统文本细读与音乐形态解析日趋成熟，当代学者正在主动借助数字人文技术、跨学科研究视角，同时立足全球化多元文化交流语境，开辟新的研究范式，持续丰富歌剧研究的边界与阐释路径。

二、歌剧分析的传统之路

歌剧作为一种综合艺术类型，其分析角度多样。回顾歌剧发展的历史长河，分析法始终是解读与解构歌剧作品的基本手法，经典的歌剧分析更为歌剧研究构筑了深厚的分析传统。其分析维度多元，涵盖了音乐织体、戏剧结构、声乐技法与舞台呈现等多个层面。从形式结构到意蕴内涵，分析法不断将听觉经验转化为可阐释的结构逻辑。音乐学分析是解析音乐作品的基本方法，关注作品在音符、音响层面的表达，是音乐研究的根基，更是音乐表演的基础（见图3）。因此，歌剧分析也借助音乐学分析（基于扎实的音乐本体研究，关联史料、传记、时代政治、社会文化等）及民族音乐学分析（关注文化语境中的音乐行为）等多元视角展开，不仅解析艺术本体要素，更探究其思想内因的哲学问题，这也构成了歌剧研究的传统范式。关于歌剧音乐层面的分析，应聚焦旋律、和声、节奏、曲式等音乐要素，探究这些要素如何服务歌剧的情感表达与剧情推进；关于歌剧舞台美术层面的分析，应涵盖舞台设计、服装造型、灯光效果等元素，这些元素共同营造了歌剧的视觉氛围；关于歌剧文化层面的分析，应考量歌剧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社会风俗及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对歌剧创作的影响；关于歌剧寓意层面的分析，应试图挖掘歌剧背后蕴含的深层思想、价值观及象征意义等。这些不同角度的分析相互交织，构成了歌剧分析丰富而多元的传统研究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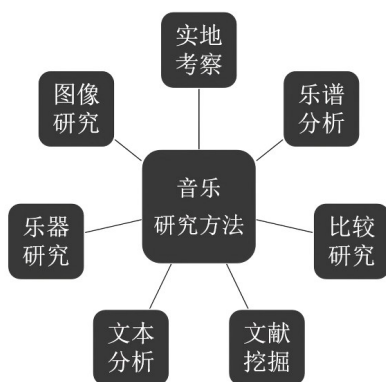


图3 音乐研究方法

（一）由表及里的音符释义

歌剧作为集音乐、戏剧、文学、舞台美术等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其本质以音乐为核心载体，因此，对其音符层面的研究是最基础的切入点，也是贯穿研究始终、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路径。音乐分析作为解析音乐本体、探究音乐现象背后本质的一种音乐研究范式，往往具有以下功能：一是对乐谱进行深入分析，探究其本身蕴含的声音意象，为歌剧研究提供了科学、系统的方法论支撑；二是追溯作曲家创作过程中的声音意象；三是研究诠释性演奏的内涵；四是体察听众对演出的即时体验。在歌剧研究中，此种范式体现为对乐谱结构、调性布局与戏剧节奏的精细拆解，致力于揭示歌剧音乐表层之下的深层结构与逻辑。如德国音乐学家卡尔·达尔豪斯在分析瓦格纳歌剧时，系统阐释了主导动机理论，梳理了音乐结构与神话叙事的关联，构建了浪漫主义歌剧分析体系^[2]。刘康华教授在研究郭文景室内歌剧《狂人日记》时，深入剖析了作品的和声语言与戏剧表达之间的内在关联^[3]。笔者在撰文聚焦歌剧《星星之火》时，特别关注了旋律与腔词的关系，如冀东方言对《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旋律的塑造作用，进而揭示了音乐与方言之间的深层联结^[4]。

歌剧历史资料研究的水平直接关系到歌剧分析的准确性。史料的考辨不仅涉及对作曲家手稿、首演记录与舞台设计图样的整理，更需要结合时

代语境，还原文本生成的具体历史场景。尤其在处理多版本乐谱或跨文化改编剧目时，历史研究为歌剧分析提供了必要的语境锚点，避免了形式主义解读的孤立化倾向。如朱利安·布登对1853年威尼斯首演版《茶花女》与1864年巴黎修订版《茶花女》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两个版本中薇奥列塔咏叹调《永别了，过去的美梦》的调性布局与器乐织体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映射出威尔第对意大利社会道德观变迁的回应，更折射出法国第二帝国时期沙龙文化对悲剧结局的审美修正^[5]。

20世纪以来，音乐分析逐步走向系统化与理论化，形成了多种学派：申克分析揭示了调性音乐的深层结构，强调了作品的层级组织；福特的动机分析聚焦主题发展逻辑；而音级集合理论则为无调性音乐提供了解析工具。这些学派不仅拓展了音乐分析的边界，也深化了人们对音乐思维的理解。由此，歌剧分析就不再局限于形式解剖，而是成为连接创作、表演与聆听之间的桥梁。

（二）整体观照的声音戏剧

戏剧构成了歌剧的整体框架，常规分析路径多注重情节结构的梳理、人物性格的塑造及戏剧冲突的设置等，传统研究范式以戏剧结构与音乐形式的对应为核心，继而延伸至角色动机的音乐表征、舞台空间的象征系统及文本与音调的语义互动。

亚里士多德《诗学》（*The Poetics*）中的悲剧六要素（情节、角色、思想、语言、音乐、景观），为歌剧的音乐戏剧分析提供了最重要的底板。本研究构建了歌剧角色分析的六边形模型，从外形、动作、心理、关系、结局、音乐维度切入，剖析角色多重身份的变迁脉络。

为了精准把握歌剧的戏剧核心，我们通过绘制“戏剧线”提炼剧情要义，以“戏剧线”的正负向发展进程勾勒剧情的演进脉络。如在分析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时，其戏剧走向成为牵引歌剧剧情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戏剧层面形成了以情节的无终递进与逆转构成戏剧动作的基本骨架，其发现与突转机制在歌剧叙事中尤为显著（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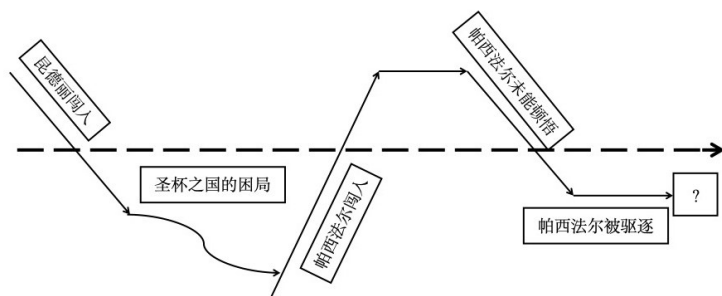


图4 瓦格纳歌剧《帕西法尔》的剧情发展态势

瓦格纳正是通过音乐节奏与戏剧节拍的耦合，在帕西法尔摆脱诱惑、城堡坍塌、归来救赎这些关键节点上放大了情感强度。如帕西法尔踏入克林索尔的魔法城堡，被花之少女环绕，遭昆德丽以身世谎言进行诱惑，就在两人嘴唇即将触碰到的一瞬间，安福塔斯的伤口突然灼痛，这一超现实反应让帕西法尔瞬间摆脱魔咒，接住克林索尔掷来的圣矛，魔法城堡随即轰然坍塌，这一突转成为

全剧的核心。而帕西法尔历经十年漂泊后重返圣杯领域，治愈安福塔斯，救赎衰败的圣杯骑士团，又构成了情节的无终递进。

角色关系网是戏剧分析的核心切入点。歌剧《蝙蝠》以男主角艾森斯坦为叙事中心，剧中所有人物关系均围绕谎言与欺骗展开，环环相扣、彼此牵制，搭建起逻辑严密、紧凑的戏剧结构（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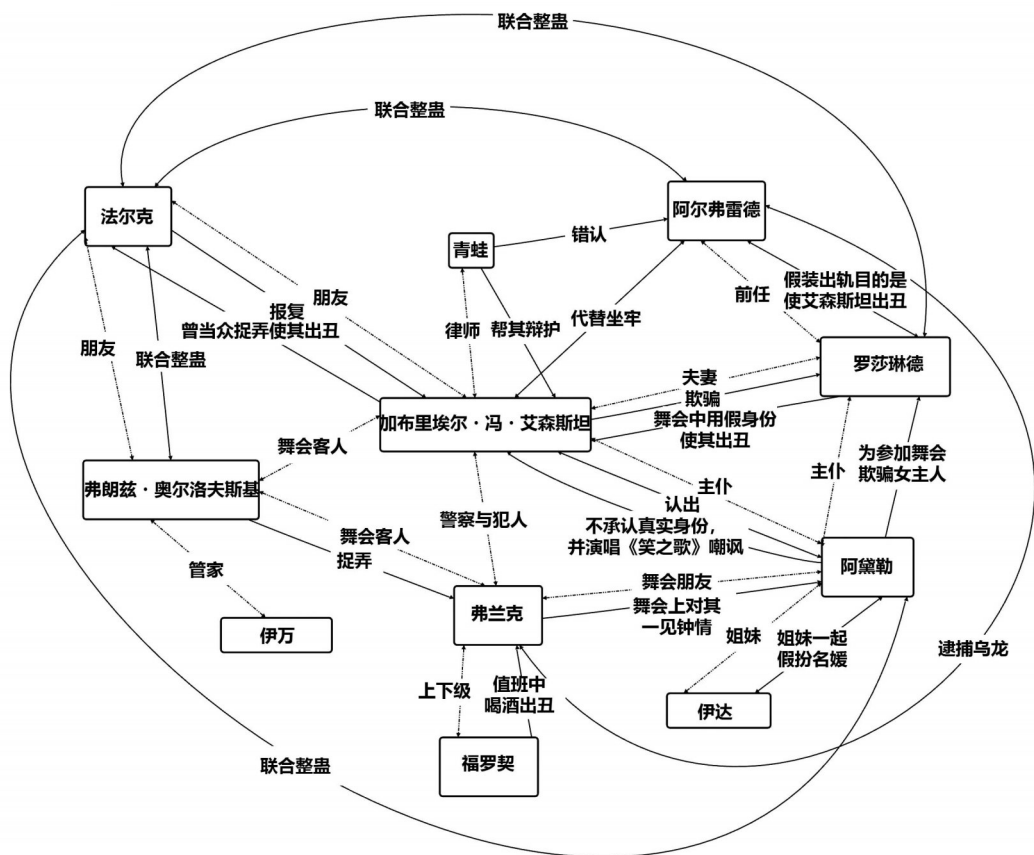


图5 歌剧《蝙蝠》的角色关系

当然，戏剧情节的走向也为歌剧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动力。作为关注歌剧与戏剧关系的经典之作，美国音乐学家克尔曼所著的《作为戏剧的歌剧》是西方歌剧研究领域权威的理论文献。该著作结合戏剧批评、历史研究和音乐分析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既触及了歌剧的深层美学理论，也涉及具体的戏剧与音乐课题，更通过剖析经典

歌剧作品阐明了歌剧分析中戏剧与音乐平衡的评判标准。克尔曼以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费加罗结婚受阻、伯爵夫人陷入爱情危机的双线叙事为例，阐明了苏珊娜是化解戏剧冲突的关键角色。而作品把戏剧结构与音乐奏鸣曲式结构相结合，堪称歌剧戏剧化创作的最佳范本^[6]（见表1）。

表1 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认亲六重唱》戏剧音乐关系

结构	主题	材料	调性	人物	剧情
呈示部	主部主题1	a	F大调	马切琳娜	母子相认的快乐
	主部主题2	b		巴尔托洛	父子相认的快乐
	连接部	c		巴尔托洛、费加罗、马切琳娜	家人团聚的温馨
	连接部	c	C大调	苏珊娜	误解费加罗的行为
	副部主题	d / e		苏珊娜	嫉妒引发愤怒
再现部	主部主题1	a	F大调	马切琳娜	作为母亲的解释
	主部主题2	b		苏珊娜	逐步消解误会
	连接部副部主题	c		苏珊娜、巴尔托洛、马切琳娜、费加罗	快乐一家人

（三）隐喻象征的思想观念

歌剧是社会的一面明镜，它能精准地映照时代面貌。透过历史长河中的歌剧经典，我们得以回望历史最本真的模样。20世纪以来，西方戏剧与歌剧作品对政治议题的探讨越来越深入。20世纪30年代，德国将瓦格纳歌剧奉为艺术化身，拜罗伊特音乐节则成为其意识形态展演的核心阵地。《纽伦堡的名歌手》被刻意抽离市民阶层的质朴幽默，转而强化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的符号化叙事。

这一政治化操弄的后果，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拜罗伊特节日歌剧院陷入停摆的困境。1951年，瓦格纳的孙子沃尔夫冈·瓦格纳和维兰德·瓦格纳通过不懈努力，使拜罗伊特音乐节重获新生。维兰德·瓦格纳推出了极简版《尼伯龙根的指环》，进一步为拜罗伊特音乐节开辟了全新的发展路径。此版《尼伯龙根的指环》以素白阶梯替代诸神殿堂，用极致留白实现去政治化表达，这本身亦是政治化影响的明证，推翻了传统史诗的视

觉体系，摒弃了所有的写实布景、盔甲、龙、城堡，只剩下空舞台、几何斜坡和强光影；用抽象雕塑与灯光暗示神话。

新音乐学于20世纪80年代在英美兴起，它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及目的上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新音乐学不再仅聚焦乐谱文本或作曲家意图，而是强调将歌剧置于更广阔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语境中解读，并在新的学术体系中融合为对音乐的历史和文化的综合研究。新音乐学主张声音实践本身即承载意识形态，咏叹调的延宕、重唱的叠置、乐队声部的压迫性织体等，都可以被解读为权力结构的听觉转译。学者麦克拉蕊聚焦歌剧的意识形态表达，其代表作《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这一研究方向的集中呈现^[7]。保罗·罗宾逊则以文化符号学视角将歌剧视作文化文本，深入解读作品中蕴含的社会意识形态与身份构建逻辑^[8]。

经典的歌剧研究方法在长期的学术积累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体系，为后续的歌剧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老道”即“道路”，更是要“道行”，这是对研究者全方位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的考查。传统的歌剧研究注重对歌剧发展脉络的梳理，从历史角度探究歌剧的演变，使研究者能够清晰把握歌剧在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与发展趋势。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歌剧研究方法逐渐显露其局限性——过于注重文本分析，对舞台表演、观众反馈等动态元素关注不足，这也催生了歌剧研究方法的创新。

三、歌剧分析的新探索

20世纪以来，瓦格纳的“整体艺术品”创作理念在歌剧分析领域逐渐深化，这种理念以音乐、戏剧、表演和舞台布景等艺术形式的融合为核心，在《罗恩格林》《尼伯龙根的指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等作品中都有鲜明的体现——讲故事、奏音符、导歌剧、跨媒介融合与文化阐释等，成

为当代歌剧研究的核心路径。歌剧分析逐渐突破单一媒介边界，强调音响、视觉、身体与叙事的协同意义生产，加速转向跨学科实践场域。跨学科视角进一步丰富了歌剧分析的内涵，在歌剧分析中融入认知科学、文化研究等维度，使这些维度在诠释音乐意义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尤其是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音乐分析正逐步融合计算模型与听觉感知研究，借助频谱分析、声学建模与机器学习手段，实现对音乐结构更为精细的识别与阐释。这种技术赋能不仅大幅度提升了音乐分析的精确性，也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即兴演奏、跨文化音响实践等复杂音乐现象的理解维度，使音乐分析在全球化与科技化的双重语境下持续演进。对表演的全方位记录，使如今的歌剧表演逐步走入分析的中心。今日的音乐分析，已不仅是音乐理论推演的场域，更成为感知与意义交互的实践空间。

（一）导演舞台的新天地

不可否认，当代歌剧领域已然是导演的核心阵地。20世纪中叶以来，歌剧舞台发生了新的转向，导演成为歌剧制作的核心，诞生了“导演歌剧”的制作理念。“导演歌剧”就是将传统的歌剧通过特定的方式解构和重组，从而给观众带来截然不同的表演效果。无论是在国内的剧场（院）还是在国外的剧场（院），歌剧的呈现都离不开“导演歌剧”这一核心表现手法。“导演歌剧”通过“陌生化”过程，旨在创造新的体验和对剧目更深层次的理解。这一过程通常涉及视觉元素，而这些元素不会直接遵守作曲家或编剧的原始舞台指示或意图。

瓦格纳家族与歌剧的导演观念密切相关。瓦格纳被学术界视为最早具备歌剧导演思维的作曲家之一，他提出，歌剧应是融合音乐、戏剧、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整体艺术，强调各艺术元素相互配合，营造完整艺术氛围，其理念已蕴含对歌剧整体呈现的统筹思维。而学术界普遍认为，瓦格纳的孙子维兰德·瓦格纳是真正意义上的首位“导演歌剧”的倡导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为了消除戏剧作品中任何让人产生联想的符号，维兰德·瓦格纳与瑞士舞台设计师阿道夫·阿皮亚合作，通过极简主义设计和强烈的象征性手法改编了瓦格纳的歌剧，并在拜罗伊特歌剧节上演。新的舞台变化需要新的研究角度，学术界不再局限于乐谱和戏剧文本，开始着重考察舞台视觉要素。玛丽·安·斯玛特通过舞台符号学分析舞台美术、灯光等视觉元素与音乐的互动，拓展了歌剧分析的舞台维度^[9]。

“导演歌剧”带来的是音乐戏剧舞台的新转向。特别是面对历史中的经典歌剧，我们唯一能够创新的方向便是视觉呈现。歌剧的传统视觉艺术（布景、服装、化妆、道具等）已经成为区分经典歌剧不同版本的核心标识。这也促使研究者不得不将研究视角从乐谱转移到真正的舞台上。“导演歌剧”经常会在作品中改变原作的时间背景，将不同的时间背景穿插在一起，营造出时空错位的独特观感，同时加上人物造型的重塑，突出歌剧制作的反差感。抛弃原作的浪漫外壳，甚至以黑暗现实等为表达载体，将歌剧转化为直面当代社会批判的惊悚剧场，这也成为研究者讨论的重点。2022年，卡里斯托·比伊托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执导了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大胆突破传统，以极具冲击力的身体语言与直白的场景设计，将原本的浪漫爱情神话解构为欲望、本能等维度，通过对原始冲动、亲密关系等的直白呈现，完成颠覆性解构。

英国1927剧团制作的默片风格版《魔笛》，将作品蕴含的启蒙精神具象化为机械齿轮与手绘动画碰撞的图景，用默片特有的节奏重构作品的内核表达。该版本以黑白影像、手绘动画与现场演奏交织融合，借由视觉搅动的独特手法，将莫扎特原作的启蒙精神转化为对当代信息过载的尖锐隐喻。整部剧目依靠影像视觉承担舞台叙事功能：舞台上仅有一块纯白背景板，而所有场景均靠动态投影实现；夜后化身三层楼高的巨型蜘蛛、帕帕基诺骑飞象，漂浮在鸡尾酒杯上；演员只能在背景板前10—20cm范围内表演。观众在虚实结

合的视觉中品味老戏呈现的新意。

为了打造耳目一新、具备视觉冲击力的舞台效果，歌剧导演们不断突破传统创作边界，大胆融合多元艺术手法，几乎穷尽一切手段革新歌剧的呈现形式，相关讨论与批评文章也随之大量涌现。然而，大量的批评并没有使“导演歌剧”的创作就此停滞，随着热烈的讨论，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好奇“导演歌剧”究竟为何，也有越来越多的剧场（院）与导演开始通过自己的方式重塑经典歌剧。

（二）声波频谱的量化世界

从音乐研究走向声音研究，成为近年来音乐学研究的新趋势。其本质是从作品中心到“声音—经验—实践—文化—技术”的全维度开放，是对听觉主体性、身体感知、空间政治、技术文化、生态伦理等的重新发现，这一转向拓展了音乐学的研究边界。

基于当代表演的分析视角，声波数据正成为解码歌剧舞台中身体性与情感张力的新密钥。随着现代分析技术的发展，借助计算机可视化技术，可以打通“乐谱—音响—情感”之间的脉络，探索可量化的研究路径，构建表演参数与情感表现的关联模型。有研究者开发并利用相应分析软件，使用IOI偏离度曲线、速度曲线、姿态轨迹等工具分析历史录音与影像，揭示微观节奏与风格演变规律^[10]。

不同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对声音频谱展开了分析。菲尔教授带领的团队，运用频谱分析，证实了声音的频率越高，能量越强，演唱的穿透力与专家评分越高^[11]。杨健教授借助相关软件，对比歌剧《茶花女》1955年卡拉斯版与2025年人工智能辅助录制版的声波频谱后发现：卡拉斯演唱的C5泛音衰减速率比新版快12%，体现了悲剧性的呼吸控制。高音区频谱能量与情绪激动呈正相关，低音区共振峰偏移对应内心波动。这些研究数据不仅为研究者探究演唱风格差异提供了支撑，也为人工智能模拟表演风格差异提供了依据，助力年轻演员精准把握演唱的声学特质。声波频谱的

量化分析恰好为这种艺术张力提供了具象化的证据。研究者在通过偏离度曲线（IOI）回溯19世纪经典歌剧录音时发现，当歌唱家在处理华彩段落时，往往会在乐谱标注的节奏框架内加入微妙的速度伸缩。当然，完全忠于乐谱的标记只是20世纪以来才形成的。学者研究发现，早前的音乐表演者在表演中罕有完全遵照乐谱演奏的，而是经常刻意偏离乐谱中的音符、节奏，甚至音乐的结构^[12]。量化工具不仅没有消解表演的创造性，反而让历史语境下的风格张力从模糊的感觉转化为清晰的数据图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艾伯利斯编制了莱克特式单簧管演奏量表，将演奏内容量化为解释、音调、节奏流动、速度、发音和乐音六个因素，为理解忠于历史与偏离乐谱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新的学术支点。因此，周全教授批判“乐谱中心主义”，强调表演是历史语境下的创造性实践，19世纪表演风格存在忠于历史、偏离乐谱的张力。

（三）姿态表演的身段要义

歌剧分析需要超越乐谱的静态文本，进入表演实践与接受语境的动态场域。歌剧分析从对音乐的平面分析到对身体的立体解码，本身就是对歌剧这一艺术体裁的深度还原。歌剧中表演者的姿态，是声音与身体的和谐共舞，是情感在空间中的具体延伸。表演者的每一个手势、每一步移动，都承载了音乐难以言表的深层意蕴。姿态既是角色心理的外在呈现，也是舞台美学的精华凝聚。姿态轨迹捕捉技术将表演者的肩颈角度、手部幅度、躯干倾斜度等转化为可比数据，这些数据都构成了歌剧分析的对象。在虚拟与现实交错的歌剧表演中，表演者的肢体语言与数字影像相互共鸣，构建出多维度的叙事空间。这种姿态不仅是表演者的艺术选择，更是文化态度的鲜明体现。如何诠释经典，取决于我们以何种方式通过身体介入历史。

有学者利用视频分析软件（如3D建模软件）为歌剧表演建立了全息模型，进而利用建模、动作捕捉等工具开展动作分析，如有研究聚焦歌剧

《白毛女》中的穆仁智角色（见图6），借助音频分析软件，通过动作捕捉技术记录其头、肩、手等身体点位的运动轨迹，计算横向、纵向幅度及方差值，揭示其“刁、狠、毒、神、气”的角色特质^[13]。



图6 歌剧《白毛女》（1952年）中穆仁智（叶扬扮演）
打灯笼的身段

以穆仁智为例，其斜目、躬身、提袍等动作，实为戏曲丑角表演的现代改编。创作者通过“表、念、做、唱、笑、舞”的综合运用，构建出“邪、痞、丑”的人物类型。利用视频分析技术，结合中国戏曲创作的表演特色，能够为构建中国歌剧分析体系探寻路径。这种“量化—质性”的互证，正在催生兼具历史厚度与方法锐度的新歌剧学。

研究范式创新与科技的赋能正推动歌剧研究从经验判断走向实证分析，从单一听觉维度拓展至声、形、场多模态交互，更从歌剧的“指手画脚者”转变为歌剧创作的参与者。这标志着歌剧研究者正从被动的阐释者转向主动的构建者，在数据与美学、技术与传统的张力中，重新锚定自身的学术身份。歌剧分析不再止于回溯真相，而是成为参与艺术再生产的活态工具。而歌剧表演研究随着科技手段的成熟，逐步可以完成一些量化客观的分析，帮助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甚至是指导音乐表演实践方面的问题^[14]。这印证了技术

理性与艺术直觉的终极和解：当数据复现手稿的“呼吸”时，分析便不再是“解剖刀”，而是“听诊器”，能在精密的频谱褶皱里，听见作曲家未曾言明的心跳。技术的精微，终为映照人心幽微效力；数据的冷峻，恰为托举艺术体温而存在。

四、歌剧分析的有形之法与自由之境

通过对歌剧新思维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多种研究手段在歌剧研究领域的核心价值。从经典文本的字句推敲到音乐结构的层层解剖，分析始终是一切研究的根基。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交叉与理论演进，歌剧研究既承袭了传统细读的严谨方法，又拓展出表演研究、接受美学与媒介分析等全新路径。传统歌剧研究路径注重逻辑与实证，新兴视角则聚焦语境与意义阐释，二者互为补充，不断深化对歌剧的理解。因此，分析不再仅是工具性的方法，而是成为不同研究维度对话的场域。

此外，在歌剧分析中无疑会更多地进行比较，通过不同文本、版本、表演风格等维度的对照，进一步拓展歌剧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笔者在中西歌剧分析的具体实践中发现，歌剧（戏曲）分析具有相互融合借鉴的可能性，即“以中国戏曲视角审视西方歌剧，用西方分析方法观照中国戏曲”的双向研究思路。西方歌剧与中国戏曲在世界音乐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二者虽源于不同文化，具有各异的发展历程，却同属于集文学、诗歌、音乐等元素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存在相通之处。这种双向研究思路的方法论突破不仅只停留在技术层面，更指向学术体系的深层建构，从个案研究到理论提炼，最终形成具有普适意义的分析模型，这正是当下歌剧研究破局的关键路径之一。

总之，歌剧分析是对歌剧个案展开“庖丁解牛”式的深入剖析，不仅需要做好理论准备，更需要探索高科技工具。精细的音乐分析是基石，深入的历史语境化是灵魂，对表演实践与诠释传

统的关注是重要支脉，而跨学科与数字人文则是前沿与未来方向。歌剧分析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扎实的个案研究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概念，进而构建起包容中西、贯通古今的歌剧研究理论框架。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技术工具的创新突破，更依赖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现代学术的批判性吸收。

参考文献：

-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国书店,1989:193.
- [2]DAHLHAUS C. Richard Wagner's music dramas [M]. Velber: Friedrich Verlag, 1971: 1-6.
- [3]刘康华.郭文景室内歌剧《狂人日记》和声研究[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1):26-37.
- [4]康啸.论《星星之火》的音乐与角色特色[C]//无终之旋律:康啸音乐研究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213-233.
- [5]BUDDEN J. The operas of Verdi: from *Il Trovatore* to *La Forza Del Destino* [M]. London: Cassell & Company Limited, 1978: 113-167.
- [6]克尔曼.作为戏剧的歌剧[M].杨燕迪,译.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100-101.
- [7]麦克拉蕊.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M].张馨涛,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23.
- [8]罗宾逊.歌剧与观念:从莫扎特到施特劳斯[M].周彬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54.
- [9]SMART M A. Mimomania: music and ges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Opera [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80-86.
- [10]黄莺,罗楚然.为爱而声之卡拉斯:歌剧《茶花女》历史录音的计算机可视化分析[J].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59(3):253-261.
- [11]HARUKA K, et al. Exploring the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that determine performance quality in opera singing [EB/OL]. (2025-06-26) [2026-01-03]. <https://del.icio.us/orq/bin/EAA/v3.10/quickview/8400>.
- [12]周全.忠于历史 偏离乐谱:19世纪的表演风格探究[J].人民音乐,2021(5):87-91.

[13] 余一玲, 康啸. 歌剧《白毛女》中“穆仁智”的丑角表演及其戏曲渊源[J].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2025(2): 4-15.

[14] 周全. 反思表演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录音分析研究的过去、现在及未来[J]. 音乐研究, 2020(3): 92-102.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of Opera Analysis and Contemporary Innovative Approaches

KANG Xiao

Abstract: Opera analysis consists of distinct traditional research paradigms and innovative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centers on the musical essence, dramatic structure, a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opera. From a musical perspective, it adopts meticulous score analysis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to examine the interplay between musical composition and dramatic narrative. From a theatrical perspective, it focuses on plot construction, character shaping, and the interactive symbiosis between music and drama. From an ideological perspective, it explores the inherent values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embedded in operatic works. After the mid-20th century, contemporary innovative approaches emerged in opera analysis, which began to expand in multiple dimensions. The rise of "director's opera" (Regieoper) elevated stage presentation to a core research focus.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has unlocked greater possibilities for stage desig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virtual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digital lighting and projection have delivered abundant creative room for stage expression.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lso facilitated the quantification of acoustic research. For instance, digital audio mixing consoles enable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storage of stage audio curve data. Fully digital processing improves sound quality, furnishing empirical data support for variations in vocal styles and performing interpretations.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brings physical performance into the research scope, enabling a shift from experiential interpretation to evidence-based research. Opera research ought to draw on Western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while grounding itself in local Chinese practices, develop analytical concepts and framewor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c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close textual read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Keywords: opera analysis; music ontology; dramatic structure; performance studies; discourse system